明刻本《鲁文恪公文集》刊印时间考

杨耀田
（中共中央党校图书和文化馆，北京　100091）

摘　要：[目的 / 意义] 对《鲁文恪公文集》版本进行考证和梳理，有助于提升古籍版本著录的准确性。[方法 / 过程] 利用文献考证法，从李维桢《鲁文恪先生集序》入手，并结合文集重刻者鲁佶的仕宦经历，对世传《鲁文恪公文集》三种明代版本进行深入分析。[结果 / 结论] 明刻本《鲁文恪公文集》的实际刊印时间应为天启三年，而非传统著录的嘉靖、隆庆、万历年间刻本，订正了长久以来《鲁文恪公文集》的版本著录错误。

关键词：《鲁文恪公文集》　方梁　鲁佶　李维桢
分类号：G256.2
DOI：10.31193/SSAP.J.ISSN.2096-6695.2024.04.16

0 引 言

《鲁文恪公文集》十卷本，明人鲁铎文集。鲁铎（1461—1527），湖广景陵（今湖北天门）人，弘治十五年（1502）会元，授翰林院编修，预修孝宗实录，深受首辅李东阳赏识。李东阳以台阁重臣“主文柄，天下翕然宗之”，鲁铎师承李氏，为其门下“六君子”之一，是茶陵诗派代表人物。正德年间累擢南京国子监祭酒，不久改调北京，有“两京祭酒”之称。后谢病辞官，家筑己有园，著论其中，嘉靖六年（1527）卒于乡。故事：四品大臣，例无祭葬、赠谥。世宗以鲁铎清节着闻，特令有司治葬，赐谥“文恪”，后不为例[1]。鲁铎“以德望闻于时”“沉潜问学，杜门敛迹，焚香危坐，日夜读书，屡起屡归，执持名节，为翰苑师儒之官，诚无愧焉”[2]，著有《莲北稿》《使交集》《东厢西厢稿》《己有园集》(《己有园小稿》《己有园续稿》）等[3]468，其中《己有园小稿》《己有园续稿》生前已有刊刻。鲁铎卒后，家人整理遗稿，编有文集传世，是为嘉靖家刻本。后世又有所谓隆庆元年（1567）方梁刻本、万历年间李维桢重刻本两种，以及民国十一年（1922）潜江甘鹏云据明李维桢本重刻本。现今学界最为常见的明刻本《鲁文恪公文集》(简称《文集》)，为中共中央党校图书和文化馆馆藏版本（简称“党校本”)，全书刻印精良，无断板漫漶，入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底本，1997 年由齐鲁书社影印出版，当时著录为明隆庆元年方梁刻本。

[作者简介] 杨耀田，男，馆员，研究方向为馆藏古籍及明清史研究，Email：43764053@qq.com。

现存多部明刻本《文集》，受书中隆庆元年方梁《文集》后序影响，多著录为隆庆元年方梁刻本，另有少数依据李维桢序文，将《文集》推定为万历年间李维桢重刻本，但因李维桢序未署时间，断代依据多出自推测。如王重民[4]认为隆庆元年李维桢年龄尚轻，“观其序文为作于成名之后，因可决定此本乃万历重刻本也。”查阅党校本《文集》，卷前同样有李维桢序，说明以往认定的刊刻时间有误。但缺乏强有力的资料支撑，仅凭推测就将《文集》定为万历年间李维桢重刻本，又似乎过于武断。目前学界尚无对《文集》的专门研究，只有几篇文学类研究论文，如周勇《明代会元别集考论》、方颖《明代茶陵派文人著述考证》、刘学超《鲁铎研究》，介绍鲁铎著作时对《文集》版本稍有提及，但也只是复述前人，一笔带过。明刻本《文集》的刊印时间，尚待进一步的探讨发掘。

1 现存明代版本

党校本《文集》书前有序文三篇，按照序文的装订顺序，依次为李维桢《鲁文恪先生集序》(不具年份)、嘉靖二十七年李濂《鲁文恪公文集序》、隆庆元年方梁《鲁文恪公文集后序》，每一篇序文都代表了鲁铎文集在明代的一次刊印。现按照传统著录，依年代顺序将三个版本罗列如下。

1.1 嘉靖家刻本

鲁铎文集的初刻本，据嘉靖二十七年李濂《鲁文恪公文集序》，应刊刻于嘉靖年间。序中提到，“公殁后二十余年，其子乡进士彭、嘉辑其遗稿，将锓梓以传，乃走使二千里，谬以序属余。”此次刊印的文集，就是方梁后序中提到的“公《莲北存集》”，万历三十三年（1605）编《内阁藏书目录》，录有“《莲北鲁文恪公存集》二册，全，嘉靖间祭酒鲁铎著”[5]。该书初版全名应为《莲北鲁文恪公存集》(简称《存集》或《莲北集》)。根据 2021 年 9 月查询，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存有两部《莲北鲁文恪公存集》，一部十卷，一部残存五卷，半叶十行，行二十一字，左右双边，白口，版心镌“莲北集”，卷端、序言题“莲北鲁文恪公存集”。作为最早整理的鲁铎文集，该书由其子鲁彭、鲁嘉编纂，也就是传统著录所称的嘉靖家刻本。

鲁彭、鲁嘉二人工诗文，能承家学。鲁彭为正德十一年（1516）举人，常年主持梦野台书院，嘉靖二十九年任广东乐会知县，有治声。居乡安贫，尽力文献，曾刊刻嘉靖景陵本《茶经》，校正《循良汇编》，编纂《乐会县志》，续纂鲁氏谱牒，节义文章推重乡邦。个人著作有《离骚赋》《雁门小桥诗稿》，卒后乡谥贞懿先生，万历年间选入乡贤祠[3]505。鲁嘉为正德十四年举人，潜心理学，未仕而卒[3]522。二人于嘉靖二十七年编成书稿，请李濂作序，李序署时为“嘉靖二十七年岁在戊申冬十有二月”，是时《存集》“将锓梓以传”，应该尚未开刻，而鲁彭又于嘉靖二十九年远赴广东任职，则《存集》即嘉靖家刻本的刊印时间，很可能是在嘉靖二十八年间。

1.2 隆庆方梁刻本

传统著录的隆庆方梁刻本，其断代依据来源于方梁所作后序。据序文记载，嘉靖四十五年冬，方梁受命任职景陵，次年即隆庆元年春，因督河工路过鲁宅，鲁氏子孙“出公《莲北存集》，

丐叙其后”，方梁对鲁铎甚为推崇，“因嘉鸣盛之集，欲传播寰宇，而刻板散失者十五矣。幸存集可据，遂居工寿梓，以补其亡。”文中明言据《存集》修补“其亡”，内容应皆本自《存集》，只是修复旧板，仅新添方梁后序，并未增补。后序所书时间为“隆庆元年岁次丁卯孟秋之吉”，可知此次修板，由春天开始，至秋天七月（孟秋）就已毕工，只经历数月，应该没有校订重刻的可能。而且鲁铎后人家风清苦，鲁彭任罢“宦橐萧然”，在他人资助下才得以返乡，所居“莞葭为垣，蓬蒿没径”，平日生活更有“家徒四壁”“安贫固穷”之语[3]505，拙于财力应该也不可能重刻。世传所谓“隆庆元年方梁刻本”，应该只是修补嘉靖旧板后的重印本，题名并无改变，仍是《莲北鲁文恪公存集》，只是新增了一篇方梁所撰写的后序。因为是修板重刊，传世版本如果阙失了方梁后序，很有可能被误认为是嘉靖家刻本。

现存可以查阅到的著录为“方梁本”的《文集》，除中央党校藏有一部外，中国国家图书馆（简称“国图”）藏两部，天一阁文物保管所藏一部，安徽省图书馆藏一部，福建省图书馆藏一部，新疆大学图书馆一部，暂有七部存世。其中，国图、天一阁、安徽省图书馆所存“方梁本”，查阅书影，书前都有李维桢序，很明显都不是真正的方梁本。国图所藏两部《文集》有完整书影上传，与党校本《文集》书影对比，相同之处俯拾皆是。如国图两部卷一叶十二 b 面（见图 1、图 2），左边栏线下侧均有断板处，与党校本《文集》一致（见图 3），可见为同一版本，而非方梁修补重刊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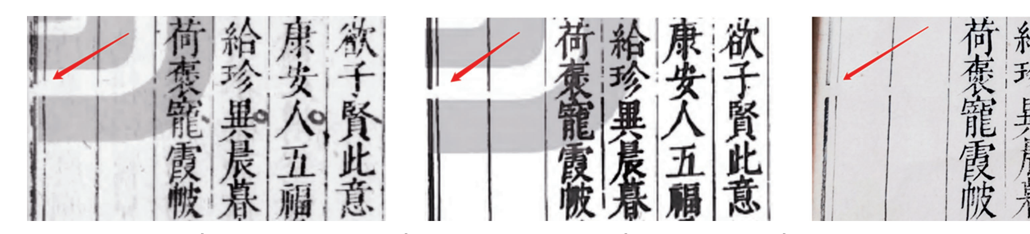


图 1　国图藏本（书号 CBM2117）　图 2　国图藏本（书号 01503）　图 3　党校本

截至 2024 年 4 月，作者尚未查阅到真正的方梁本。《中国古籍总目》载日本尊经阁文库藏《莲北鲁文恪公存集》十卷，著录为明隆庆年间刻本，应该就是一部少见的方梁本，是以隆庆元年方梁后序为断代依据，书名仍是《莲北鲁文恪公存集》，可惜无缘得见，只能推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记载的浙江孙仰曾家藏本《鲁文恪存集》十卷①，从题名来看，有可能是方梁修补重印本，因为只是修补旧板，所以书名仍为《存集》而未改变。可以肯定的是，方梁本题名未曾改变，仍题为《存集》，与后来题名为《文集》的版本明显不同。党校本《文集》中的李濂《鲁文恪公文集序》、方梁《鲁文恪公文集后序》，应该是重刻时统一书名后的结果，李濂、方梁的原序名应该是《莲北鲁文恪公存集序》《莲北鲁文恪公存集后序》。福建省图书馆、新疆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所谓“方梁本”《文集》，应该也是与党校本版本一致的隆庆之后的重刻本，否则应该著录为《存集》，而不是《文集》。

1.3　万历李维桢重刻本

现今存世的所谓万历年间“李维桢重刻本”，与前述党校本《文集》其实为同一版本，因为断代不同而产生了著录差别。作者查访统计，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

馆各藏一部，著录为明万历年间京山李维桢校刊本。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藏一部，著录为明万历年间巳有园刻本。这一版本都有李维桢序，正文卷端题“鲁文恪公文集”，版心上镌“鲁文恪公集”，半叶九行，行二十字，白口，单黑鱼尾，偶见白鱼尾，左右双边。卷端下方题“竟陵鲁　铎振之著 / 京山李维桢本宁校”，书中“校”字不避明熹宗朱由校御讳，因而常被鉴定为万历年间京山李维桢重刻本。党校本内封更镌有“己有园藏板”“李本宁先生鉴定”及朱印木记二处。耶鲁大学图书馆藏本应该也保留有内封，因“己”刻为“巳”，故著录为“巳有园刻本”。

书中卷一收赋二篇，卷二至卷四为诗及词六首，卷五为《使交稿》，卷六以下为杂文，有李维桢、李濂、方梁序文三篇，序文位置各书不同。李维桢序后有钤印三方，一“呰生大胍”，一“人在下中，”一“太史公牛马走”，考李维桢生平，其人庠籍京山，实为景陵皂角市人，与鲁铎为同乡。嘉靖二十六年（1547）生，隆庆元年（1567）虚龄二十，应无资历为《文集》校订作序。观其钤印，“呰生大胍”，语出《史记》评楚越百姓“呰窳偷生”一句，暗含印主楚人、弱劣之意。“人在下中”同样典出《史记》，自谦之余又有沉沦下等的感叹。二印意境颓丧，不似年轻人所用。“太史公牛马走”为司马迁自谦语，李氏以之自况，而“太史公”之称，更可确定为李维桢入翰林后事。他于隆庆二年中进士，由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万历初年参与编纂穆宗实录，事毕进修撰，身为史官，故有“太史公”之称。后因声誉过隆为人嫉恨，遭排挤外放，浮湛外僚凡三十年，郁郁不得志。万历三十七年于陕西右布政使任上，因仲弟陷狱，谢病辞官奔走周旋，“留滞广陵、金陵间，遂及三年”[6]。万历三十九年事平后，又因家事不宁，“傲弟不见德，反轇轕之。家居惧祸，衰晚避地”[7]14，居南京数年。这一境遇，正与“呰生大胍”“人在下中”所含意境相符。明人推重翰林，李维桢虽官职周转，仍被尊呼为李太史、太史公，作文更常自署“翰林院国史修撰官”，“太史公牛马走”的钤印也就合乎情理了。以上三方钤印，多见于万历四十年后至天启初年李维桢所作序末，如万历四十三年刻《明政统宗》、四十四年刻《赐闲堂集》以及天启元年（1621）刻《武备志》李氏序末，三方钤印排列和党校本完全相同，应该是他这一时期的惯用印章。综上所述，基本可以确定该序为李维桢于隆庆之后所作，党校本《文集》可以断定并非隆庆元年方梁修补印本。而且通过分析李序中的片段，可以推论出重刻本的实际刊刻者并非李维桢，而是另有其人。

2　刊印时间考述

查阅李维桢万历三十九年自刻《大泌山房集》，并未收入《鲁文恪先生集序》。常理来说，为乡贤大儒文集撰写序文是一件光彩事，不可能不选入自己文集。《大泌山房集》一百二十八卷，序文就有四十六卷，书序更是占了一半，无论交游应酬亦或书坊求请，无所不收，不可能单单脱去此序，可知这篇序文一定作于万历三十九年之后。细读李维桢所撰《文集》序文，其中有“先生孙太守仕丽江，重校遗集，属余序”一句，明清常以“太守”作为知府别称，由此可知本书当为曾任“丽江”知府的鲁铎之孙主持重校，只要查明此人身份，相关疑问也就迎刃而解了。

明代丽江府只有云南一处，当地知府都为木氏土司世袭，并无内地流官任职，所以文中“丽江”应该不是云南丽江，而是某地别名。鲁铎之孙既能任职知府，按理应是科举出身，查乾隆《天门县志》科贡表，万历三十九年之后，鲁姓曾任知府一职者，只有万历辛卯（十九年）科举人“鲁佶”，“仕至太平知府，以河功升。”[3]484 明代太平府有两处，一为直隶太平府，即今安徽当涂；一为广西太平府，在今广西崇左，府治“南有府前江，即丽江”[8]，可见鲁佶任职地应是广西太平府，因流经境内的左江河段古称“丽水”“丽江”，因此被李维桢移用作了雅称。

鲁佶万历十九年中举，三十六年任睢宁知县，在任体贴民意，又因河功为操江提督荐举，四十一年升任邳宿同知，驻邳州管理河务[9]。康熙《邳州志》、乾隆《徐州府志》都记录鲁佶于邳宿同知后升任太平府知府，继任者于天启二年接任。按照惯例，鲁佶于天启二年之前，应该一直都在同知任上。《东冈鲁氏族谱》（简称《族谱》）收录万历四十五年三月《直隶淮安府管河同知鲁佶父母诰命》《直隶淮安府管理邳宿河务同知鲁佶并妻诰命》，以及天启元年三月《两淮都转运盐使司同知鲁佶父母诰命》《两淮都转运盐使司同知鲁佶并妻诰命》[10]49–55。综合诰命内容，鲁佶为“原任广州琼州府乐会县知县”鲁彭之子，初任正五品同知，于邳州管理河务，四十五年获“奉政大夫”散官。之后又因辖区近海，漕运盐务并重，而“秩则盐使者为优，故有行水之臣加以盐官之秩者，欲久其任，不得不重其报也”[10]51。加官为两淮都转运盐使司同知，升从四品，天启元年三月又获“朝议大夫”散官，并给诰命。综上所述，天启元年三月至天启二年之间的某一时间，鲁佶升任太平府知府，由从四品升任正四品的知府，再次转为治民官。

然而，查考雍正《太平府志》及《广西通志》，明代万历、天启年间，并无鲁佶就任知府的记录。两志皆载，区日振于万历四十四年任太平府知府，天启元年九月升任广西按察副使，之后知府一职由李友梅接任，至崇祯二年（1629）才被接替[11]，这说明鲁佶因为某种原因没有实际赴任。据《族谱》记载，鲁佶生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冬[10]67，天启元年（1621）已经 65 岁，正是明代外任官员的法定致仕年龄。为抚慰致仕官员，明廷规定四品以下官员，可以依例“各升一等，给与诰敕”[12]。同时明代自嘉隆之后，官场愈重出身，府官选任渐循资格，多由出身进士者就任。鲁佶举人出身，仕至从四品同知已属不易，致仕时按例升一等，授予边省正四品府官职衔，符合当时官场惯例。鲁佶应该是在法定退休年龄，以知府加衔致仕，归里家居。

总而言之，天启元年的后半年，很可能是在九月之后，鲁佶被授予太平府知府一职，此后就以知府的致仕身份交际酬拜，被尊称为“太平公”“太守”，作为地方名门之后，开始专心家族著述。鲁佶家乡景陵是承天府辖地，作为嘉靖皇帝龙飞之域，随着地方建制的升格，原本寂寂无闻的景陵迎来了一次文化发展高潮，以钟惺、谭元春为首的文学流派竟陵派即由此发端。鲁氏家族更是文风相继，鲁铎本人为茶陵诗派文人，鲁彭主持书院刊刻文献，庇佑景陵地方文脉的传承。鲁佶仕途虽然顺意，但相比祖父的会元出身、京职祭酒，他的举人身份、外任同知，在重内轻外的明代官场并不出彩。父亲虽然拙宦，但也在地方文苑占有一席，自己与之对比，不免稍逊风骚。在官场交际中，因为祖父声名，他时常被人求取家集，同乡钟惺即“喜诵乡先达鲁文恪

诗文，庚戌官燕，曾从其孙睢宁令乞一部”，不久就被名流汤宾尹索去，可见鲁铎文集颇受士人青睐。万历四十年，同里谭元春又于南京选鲁铎诗九十首，刻成《鲁文恪诗选》[13]，传播士林。这类因由，都可能令鲁佶萌生了重刻家集、传递文献的意向。士林交际需求，家学文章传播，自己年老体衰，家中存集无多，旧刻书板很可能已经年久朽坏，使得校订重刻祖父文集成了鲁佶迫在眉睫的首务。李序中称“先生子孙多贤，而太守文学、政事颇有祖风”，政事不庸细表，所谓“文学”即指鲁佶热衷于编纂家族文献，故称“是集也，绎思绳武之资也”，称赞鲁佶审校刊印文集延续家族文风的做法。

又据《族谱》所记，早在任职睢宁时，鲁佶就曾嘱托侄儿组织家谱编纂，直至他回乡后方才刻成。可知鲁佶对家族著作的整理，包括校勘祖父遗集的工作，大约在万历末年就已经开始筹备。此时的李维桢正“侨居白门、广陵间”“海内谒文者趋走如市”[7]13,“远近乞文者日填于门巷轴，碑版几遍天下。公性多可少否，人无贵贱贤愚，事无大小，有求必应，无所受谢”[14]。鲁佶钦慕李氏文名，以同乡名义与之应酬，可能曾将家集相赠，给李维桢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后来为《文集》撰写序文，特意提到自己“尝卒业其集而私评之”，序末更署名“里人后学李维桢”，一反以往自署“京山李维桢”的常态，而自认景陵人鲁铎的同乡后学。《大泌山房集》还收有李维桢《祭鲁孝廉》一文，记述鲁佶父亲鲁彭晚年生活，极尽褒扬之词，称赞其“子孙象贤，教成于家而行于国，邑之文献于此焉出”“先生（鲁彭）当在文恪之间，其尚有穰吾邑也夫”[15]等语，誉美鲁佶将传继父祖遗风、兴旺桑梓文化，可见两人交际匪浅。因而居乡重校期间，被李氏尊呼“太守”的鲁佶，为给家集添彩，特请“负重名垂四十年”的同里文豪李维桢为家集作序，甚至请其署名校订先人遗集，也就顺理成章了。

细审李维桢生平，他于万历三十七年辞官后，侨寓金陵十年，四十六年归里，以布政使衔（从二品）家居。泰昌元年（1620）八月起用为南京太常寺卿，命下未及一月光宗崩逝，旋即令以新衔致仕，继续家居②。时人重京职而轻外任，李维桢从此自署南京太常寺卿（正三品）。天启三年五月李氏又被原职起用，辞而不就。四年四月“缘史事起用”，任南京礼部右侍郎，旋升南京礼部尚书，但“名曰录用，实不令与史事”[7]12。“馆中惮其前辈压己，不令入馆，但迁其官”[3]546。李维桢见事不可为，于五年正月以年衰辞任，驰驿归乡，六年闰六月卒于家③。天启元年致仕居乡的鲁佶请其作序审订，常理来说，应该是两人都居乡闲居时最为便宜，所以最有可能发生在天启元年至三年、五年至六年这两个时间段内。从钤印方面来看，李维桢天启三年孟冬（十月）为《鹿裘石室集》所作序，钤印新增“奉常之章”，以彰显南京太常寺卿的致仕职衔。任职南京礼部后，更新增“宗伯之章”“大宗伯章”两方新印，为人作序时，在序末和前述“呰生大瓜”等三方旧印混用。根据这一印章使用习惯来推断,《文集》序文很可能是李维桢第一次居乡期间所作，即天启元年至三年之间，新印章还未启用前。

而根据李序开篇第一句“本朝名臣谥文恪者十九人”可知，明朝开国至李维桢作序之间，共有十九位文臣获得“文恪”的谥号，通过列举可知第十九位获谥者是吴道南④，他在天启三年九月卒后获谥。结合天启三年十月李维桢在《鹿裘石室集》序文中启用的“奉常之章”，可以推测《文集》序文应该作于天启三年九十月间，故而《文集》的刊印时间，可以大胆的推断为天启三年⑤。至于文中“校”字直书，不避明熹宗朱由校御讳，应该和刊印避讳不严有关，在天启年间

甚为常见，并不能作为刻板刊成于万历时期的证据。

至于校订一节，党校本《文集》卷端冠以“李维桢本宁校”及内封镌“李本宁先生鉴定”，又将最后撰写的李维桢序置于书首，李濂、方梁二序之前，应该只是鲁佶借重李维桢文名满天下的宿望，求得李氏同意后冠名书前以张声望，并非本人亲自重校。所以李序中说“先生孙太守仕丽江，重校遗集，属余序”，直言鲁佶“重校遗集”，自己只是被嘱托作序。而且《文集》虽言重校，内容却甚为草率，显然没有经过认真的校对整理。像鲁铎所著《己有园记》在嘉靖年间就广为传诵，在一些著作中均有收录，和《文集》比勘内容，文字多有不同。现选《己有园记》末一节举例（见表 1）。

表 1 中的《沔阳志》刻成于嘉靖十年，此时《己有园小稿》《己有园续稿》已先后印行，引文应取自其中。《皇明名臣言行录续集》则明言引自《己有园集》，二者之间只一字不同，应该只是“葢”（盖）、“益”相像，刻印不清导致错讹。而《文集》本与之对比，字数减少文字改变，变动甚大。此外清初朱彝尊辑《明诗综》，收录鲁铎诗三首。其一为《古塔滩》，内容与《文集》本相同。另两首，《凫洲即事》“半日未能回”一句，《文集》本作“未开回”；《庄居漫兴》“唯有东湖隐者”一句，《文集》本作“钓者”。朱彝尊长年供职内廷，选诗可能抄自内阁所藏《存集》，三首诗就有两首与《文集》本不同。以上例证可以想见鲁佶重校本的粗陋，所谓出自李维桢重校，更似借名宣传之举。

表 1 《己有园记》末节文字勘对

文献出处	嘉靖十年《沔阳志》志十一《儒学》	嘉靖三十九年《皇明名臣言行录续集》引《己有园集》	鲁佶重校本《鲁文恪公文集》卷六
文献内容	盖吾材类樗，而今复病，是加之朽也，樗而朽，益无所用之。无用，则无所属，无所属，吾其属吾矣，吾吾属，吾园始为吾有也。苟药物能吾扶，孰使吾不乐？	盖吾材类樗，而今复病，是加之朽也，樗而朽，盖无所用之。无用，则无所属，无所属，吾其属吾矣，吾吾属，吾园始为吾有也。苟药物能吾扶，孰使吾不乐？	盖吾材类樗，而今复病，是加之朽也，樗而朽，益无所用之。无用，则吾其属吾，而吾园始为己有也。苟药物能吾扶，孰使吾不乐？

党校本《文集》字迹清晰，无断板漫漶，应非修补旧板，内封镌“己有园藏板”。“己有园”为鲁铎故园，更印证了本书为鲁氏家族刊印，另有“本衙藏板”、太极八卦图朱印木记。全书校勘不精，突出李维桢以作宣传，字体则为万历年间开始流行的长方形宋体字，偶有歪斜不甚工整，版式风格颇类当时的吴地刻本，应该是委托该处书坊承刻，而非合刻贩卖。一来鲁佶常年任职漕运，待遇丰厚，应该有财力支撑编纂费用，刻印只为传播交际，不需和书坊合刻筹资；二来《文集》本流传极少，甘鹏云自言“求之三十年不可得”，后从鲁氏裔孙处，访得“族间有旧刻一秩，殊矜贵不轻示人”[16]，方才据之重刻，现存著录也不过数部，如为书坊传刻牟利，不至于如此稀缺。明代民间刻书，以金陵、苏州为主的吴地最精，文化繁荣书坊云集，又因与湖北水运相连，楚地文人常将著作携至当地刊刻，鲁氏同里名人，如景陵钟惺、谭元春，京山李维桢、郝敬等人书稿多刻于此。鲁佶常年任职淮安及运河一线，对吴地的刻书业必然十分清楚，将家族文献及族谱整理完毕后，交由吴地书坊刻印修补，显然符合常理。党校本《文集》很可能就是由鲁佶稍作整理后，附上李维桢的序文，在天启初年由吴地书坊承刻出版。

3 结 语

鲁铎文集，世传明刻本有嘉靖家刻本、隆庆方梁刻本、万历李维桢重刻本三种版本，经考证，应更改为嘉靖家刻本、隆庆方梁修补本、天启重刻本。嘉靖家刻本书名为《莲北鲁文恪公存集》，书前有李濂《莲北鲁文恪公存集序》。隆庆方梁修补本应为隆庆元年方梁据嘉靖旧刻板修补后的重印本，书名仍为《莲北鲁文恪公存集》，新增方梁《莲北鲁文恪公存集后序》一篇，置于书中。而所谓的万历“李维桢重刻本”，即《鲁文恪公文集》一书，除李濂、方梁序外，新增李维桢《鲁文恪先生集序》，实际刊印于天启三年。现存古籍中，含李维桢序而著录为隆庆元年方梁刻本，亦或万历年间李维桢重刻本，应该更正为明天启三年鲁佶己有园刻本，以正其误。

【注释】

①《四库采进书目》载《浙江省第四次孙仰曾家呈送书目》，记录为“鲁文恪公集，十卷，明鲁铎著，四本。”有人据此以为该藏本是《文集》本。但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记载，“是编为其子彭、嘉所编。”丝毫没有提及李维桢，可知孙仰曾家藏本确为《存集》本。

②据《明光宗实录》《明熹宗实录》。《明史》记为“天启初，以布政使家居。”不确。

③康熙《上元县志》记载李维桢“因移疾乞致仕，侨居白门。”应该是将他万历末年居住南京的经历搞混。此次致仕后，李维桢即刻回乡，曾于南郡（荆州府）旅舍，遇到因奢安之乱回乡受阻的云南人唐泰（后出家为画僧，以“普荷担当”名世），为其《脩园集》作序。

④按卒年排列，依次为朱善（1385，正德间追谥）、宋讷（1390，正德间追谥）、吴讷（1457）、耿裕（1496）、王鏊（1524）、杨廉（1525）、鲁铎（1527）、温仁和（1543）、孙升（1560）、丁士美（1577）、林爊（1580）、周子义（1586）、范谦（1598）、余继登（1600）、曾朝节（1604，天启元年准谥）、唐文献（1605）、杨道宾（1609）、傅新德（1611，天启元年准谥）、吴道南（1623）。天启四年（1624）十月朱国祚卒谥文恪，李维桢序文应作于朱国祚获谥之前。

⑤李序中又有“今去先生百年”一句，或以为鲁铎卒于嘉靖六年（1527），“百年”之后正是天启六年（1626），为李维桢第二次居乡期间，结合上述考证，可知此处的“百年”应是泛指。

【参考文献】

［1］明世宗实录［M］. 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3664.

［2］（清）钱谦益. 列朝诗集・丙五［Z］. 清顺治九年刻本，1652：35.

［3］（清）章镳. 乾隆・天门县志［M］//. 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北省府县志辑. 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

［4］王重民. 中国善本书提要［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585.

［5］（明）孙能传等. 内阁藏书目录・卷三［M］//. 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第四册. 北京：中华书局，2006：350.

［6］（明）李维桢. 大泌山房集［M］//.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一百五十册. 济南：齐鲁书社，1997：270.

［7］（明）钱谦益. 牧斋初学集・卷五十一［Z］. 明崇祯十六年刻本，1643.

［8］（清）张廷玉等. 明史卷四十五・地理六［M］. 北京：中华书局，2000：759.

［9］（清）刘如宴等. 康熙・睢宁县志・卷十［Z］. 清康熙五十七年刻本，1718：15-16.

［10］（清）东冈鲁氏族谱・卷首诰命［Z］. 清光绪十三年刻本，1887.

［11］（清）甘汝来. 雍正・太平府志・卷二十九［Z］. 清雍正四年刻本，1726：4.
［12］（明）申时行等. 明会典・吏部・致仕［M］. 北京：中华书局，1989：81.
［13］（明）钟惺. 隐秀轩集・卷八［Z］. 明天启二年刻本，1622：55.
［14］（清）张尊德等. 安陆府志・卷二十［Z］. 清康熙八年刻本，1669：13.
［15］（明）李维桢. 大泌山房集［M］//.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一百五十三册. 济南：齐鲁书社，1997：389.
［16］（明）鲁铎. 鲁文恪公集・鲁文恪公集跋［Z］. 民国十一年甘鹏云崇雅堂刻本，1922：427.

A Study of the Printing Time of the Ming Dynasty Block-Printed Edition of *Lu Duo's Anthology*

Yang Yaotian

(Library and Cultural Centre of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Beijing 100091, China)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Conducting research and sorting on the versions of *Lu Duo's Anthology* can help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recording ancient book versions. ［**Method/Process**］ Using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review, starting from Li Weizhen's Preface, and combining with the official experience of Lu Ji, the author of the reprinted collection, this paper conduct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three Ming Dynasty versions of *Lu Duo's Anthology*. ［**Result/Conclusion**］ The actual printing time of the Ming edition of *Lu Duo's Anthology* should be in the third year of Tianqi, rather than the traditional editions recorded during the Jiajing, Longqing, and Wanli periods.The paper corrected the long-standing version recording errors in *Lu Duo's Anthology*.
Keywords: *Lu Duo's Anthology*; Fang Liang; Lu Ji; Li Weizhen

（本文责编：孔青青）